

西北軍整訓內幕

王禹廷

——馮玉祥與西北軍之二十

國民軍的整編演變

國民軍自從天津、北京先後撤退以後，重新改編為七個軍十二個師。這些軍、師雖然是屬於「首都革命」後成立的第一、二、三、五各軍的部隊，但已打破了各軍原來的系統。因為國民二軍的主力，已在河南潰滅，留在察、綏地區，僅編成了一個師（弓富魁），三、五兩軍留存的實力也很薄弱，同樣的各自編成一個師（徐永昌、方振武）。等到南口棄守，向綏西撤退之時，各部隊損失更多，益形紊亂，原有七個軍的番號遂不存在。馮玉祥五原誓師後，重新整編，就以師為單位，不復有軍的番號了。而所有的兵力，則仍以原屬國民一軍的部隊為主體。它們於敗戰流徙之後，精神渙散，士氣低落，紀律廢弛，編組凌亂，已不成其為一支完整強大的武力。馮玉祥被推為全軍統帥，肩負着劃時代的大使命，他必須把這支武力，很快的重振起來，方可履行其艱鉅的任務，而重振的着手之處和要點所在，則是

整編和訓練。

馮軍膨脹漸有派系

先說整編：

國民聯軍既是以一軍為主體，我們就先從一軍談起。一軍是馮玉祥一手編練而成，源出北洋陸軍的正規部隊。馮氏治軍素嚴，一軍由一個營為基礎，逐步擴張，循序漸進，它的素質本來非常單純而健全。但在民國十四年收納了察、綏地區的許多部隊，又經過十五年一連串的敗退，其內部乃發生了若干變化。

首先是人事上有了派系。這一現象由於民國十一年，馮氏先後出任陝（西）、豫（河南）督軍，陣容較前擴大，即已萌生了出來，它們形成爲「老二營派」和「二十鎮派」。所謂「二十鎮派」是民國成立以前，馮氏在二十鎮（師）營管帶（營長）時的舊部或同僚，以及憑着這種舊關係陸續來投歸他的一批人。這批人每年有一、二次餐會，多由鹿鍾麟、張之江、張樹聲、石敬

亭等人負責籌辦，無形中他們就成爲這一派的領導者。「老二營派」則是民國元年，馮氏任左路備補軍第二營營長，招兵買馬時來投效的一批人。這批人沒有人出而領導或舉行什麼聚會，但其實力却可與「二十鎮派」分庭抗禮。李鳴鐘、韓復榘等則跨有兩派的關係，可以說是左右逢源。他們雖然有這樣隱隱約約的派系之分，却沒有什麼實質上衝突或爭執。後來團體越來越擴大，派系的分別也跟着越來越明顯，且有了若干的分合變化。民國十五年南口戰役前後，馮玉祥出國，張之江代馮統率全軍，他與鹿鍾麟對於事情的看法和作法有所不同，乃漸漸發生了界限距離，下面的人就有了親張親鹿的分野。又馮氏在南苑練兵，繼而出任西北邊防督辦，開府張家口之後，覺得局面日漸擴大，原有的老幹部，無論數量及素質，已不能適應新時代的需要。乃吸收了保定、陸大，以及日本士官等軍校出身的學生。這批人初來時，大都担任幕僚及教育訓練的工作，並沒有抓到兵權。日子久了，他們深知有兵權

才有力量，才能發展，於是就動腦筋擠舊人，握兵柄。馮玉祥也想磨鍊他們帶兵作戰的經驗，運用他們的學術素養來提高部隊的素質，乃漸漸選派他們去帶兵，如劉驥、李興中等人皆屬之，這批人便形成馮軍新興的「第三勢力」。

領導階層起伏變化

其次是領導階層的變化。馮軍五虎上將中之二虎，張之江和李鳴鐘，自從五原誓師以後即告失勢。既未能如鹿鍾麟之統率大軍，指揮作戰。也沒有如宋哲元、劉郁芬之膺寄方面，開府封疆。馮玉祥在俄國時，即派李鳴鐘赴廣州，後來到了河南，又派張之江赴南京，作為他的代表，向蔣總司令及國民政府有關部門，負責接洽連絡及交涉經費採購軍品等事。迨北伐成功，馮氏與中央政府離異之後，這兩人就投效中央，與馮氏化離了。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，他二人對於瓦解馮軍，結束戰爭，都曾出過力，立過功。因此，李鳴鐘出任豫鄂皖三省邊區清鄉督辦，張之江出任江蘇省邊區清鄉督辦。

鹿鍾麟和劉郁芬於中原戰敗後，無兵無勢，失却了任用的價值，均未獲什麼安置。劉還得了個軍事參議院參議的閒差使，鹿連這種類似的名義也沒撈到。宋哲元當時沒有直接歸順中央，帶領着一部拚湊而成的軍隊，漸漸在華北成了氣候。二十五年初，馮玉祥出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，曾給鹿鍾麟弄了個什麼委員或參議之類的職銜，在南京供職。抗戰開始，華北及東南各省相繼淪陷，國民政府遷到武漢辦公。由於馮玉祥的力

保，中樞特任鹿鍾麟為冀察戰區總司令兼河北省主席。鹿氏於二十七年春間，由漢口北上，挺進到黃河以北的敵後地區，執行任務。在日軍和共匪兩面夾擊之下，堅苦奮鬥了兩年多，無力支持下去，二十九年奉調回渝（重慶）。抗戰末期，出任兵役部部長，曾大力整頓兵役行政。

馮玉祥的這五虎上將，看起來只有鹿鍾麟對馮最為忠心，馮對鹿也是信任有加，極力照顧，兩人情誼，始終無間，算是難能可貴的了。馮、張、李、鹿諸人，在（南）京在渝（重慶），時相過從，經過了如許滄桑，難免不有若干感慨。但是甘苦與共，相處多年的袍澤深情，總還是存在的。

三十五年八月，張之江在南京過六十七歲的生日，馮玉祥、鹿鍾麟等幾個老朋友，同去道賀，且會照相留念。白雲蒼狗，所有的恩怨是非，皆隨時間而消逝，在事諸人，皆已垂老，或不無今昔之感也。

新起人物漸露頭角

再次是新興一代的崛起。民國十四年天津之戰，韓復榘斬露頭角。十五、六年南口之守，劉汝明大顯身手。南陽之攻，孫連仲頗著奇功。而西安解圍，鄭州及徐州兩次會師及豫東魯西地區的大戰，則是孫良誠的得意傑作。當年十一師時代的團營長，至此皆陸續脫穎而出。孫連仲、石友三、吉鴻昌、劉汝明、張維璽等人，都是轉戰各地，卓著功勳。孫良誠和韓復榘，且很早就出任山東、河南兩省的主席，成為顯赫一時的風雲

人物。

以上所說國民一軍的離合變化，在當時不但關係着它本身的榮枯，而且與國民革命北伐大業的成敗，也是息息相關，所以不憚繁瑣，作了一個較為詳盡的概要交代。至於二、三、五各軍，則因淵源不同，問題更多。它們實力薄弱，素質參差，訓練及紀律均欠嚴格。在革命陣營中雖然各有其貢獻，但所起的作用和影響，殊不能與一軍同日而語。但是國民二軍，因為留在陝西的部隊較多，勢力較大，且佔有地利之便。如果對它們稍有疏忽，就可能發生意外事端。馮玉祥有鑒於此，所以特別看重于右任的關係，五原誓師之後，讓他先期回陝，收拾舊部，協力解西安之圍。且於十六年一月，由綏赴甘途中，電委于氏為國民聯軍駐陝總司令，希望他統攝各軍，納諸正軌。于右任雖然是革命元勳，軍事究非其所長。往年統率陝西靖國軍，固然有一段漫長的堅苦奮鬥的光榮歷史，可是最後還是受不了主客觀情勢的影響，不得不離軍遠走。此番他重建旗鼓，一切施展的并不十分順利。馮玉祥身為全軍統帥，便不能不籠罩全局，一體照顧。

那末，面對這樣一個龐大而複雜的局面，馮玉祥如何能够鍊鐵成鋼，化腐朽為神奇，凝結成一個整體力量呢？

答案就是前面提到的整編和訓練。

五原整編與暫編師

整編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。第一個階段在五原。那時因為長途潰退，僅

有少數的部隊長能够確實掌握他的部屬，保持原有建制，很多都四分五裂，不成系統。有的是一個番號下容納了好幾個不相隸屬的小部隊，有的是一個部隊分成了幾個小單位，或者番號大而人數不足，或者人多槍械少。因此到五原附近收容整理時，便有爭人爭槍，相持不下，甚至發生衝突，彼此鬥毆，鬧的不可開交，張之江和鹿鍾麟，都無法收拾擺平，張氏且離綏西去。

馮玉祥誓師後，便憑藉他的權威，以快刀斬亂麻的手段，澈底整編。他把這些紛如亂絲的隊伍，一律按照人員和槍枝數目的多少，及其在撤退期間表現的優劣，汰弱留強，以少就少，歸併的歸併，裁撤的裁撤，幾天之內，完全整編就緒。多出來的官長，一律收容到總司令部，成立了一個暫編師，以宋哲元為師長，下面的旅、團、營、連、排長等幹部，都按照他們原來的職級，統統予以委派，就是沒有兵也沒有槍。人或不解，問他弄這個空架子的師幹什麼？他說這不是空架子，是在安置和培養幹部，待前方打了勝仗，繳來武器，再徵兵補充起來，不就成了完整的部隊嗎？後來的事實發展，完全照他的這個計劃實現了。

整編的第二個階段在西安。五原誓師整編部隊，完全以師為單位。

民國十六年初，馮玉祥到達西安，看到革命軍事進展的很快，部隊急須擴張，便與南方的北伐軍看齊，把原來的師，一律擴編為軍。同時對於原駐陝、甘兩省的地方部隊，也視其駐地、兵力、及履行任務的需要，一律給了新的番號。

這裏應當把國民二、三、五各軍以後的演變，順便作一個概略交代。并插敘幾件有趣的故事，以博讀者一笑。

袁世凱耍人和被耍

袁世凱一生玩弄權術，重視力量。民國成立之初，國父和黃克強到達北京。袁世凱於辛亥革命前後孫、黃並稱，以及「孫氏理想，黃氏實行」的傳說，誤認為國父長於理論而拙於實踐，所以，他對國父表現的很熱絡，很敬重，內心裏却不怎麼畏懼。對黃克強則不然，除了尊重之外還有幾分忌憚。有一天，袁氏設盛宴請黃，陪客皆是名重一時的大人物。酒過數巡，袁世凱不大經意的說：我從前沒有見過克強，以為是天下英雄，今日一見，却不盡然。黃克強聽了勃然變色，舉座也顯得不安。袁氏稍停，又接着說：我看克強儀態雍容，氣質高華，乃知偉人風度，的確不同凡響，豈止英雄而已。他談笑自若，黃及全座的人都為之釋然，盡歡而散。次日，某一與宴者問袁：黃克強是革命元勳，您昨天為什麼似抑似揚的那樣調侃他？袁說：我是試驗他的。一語激之則怒，一語譽之則喜，簡直像個小孩子，那裏還能成得了大事，以後我對他沒有什麼好顧慮的了。當時知者都說袁世凱「顛倒英雄」，「耍」了黃克強一下。這件事民國三十五年，筆者在北平時，親聞於某大老之口，而且也看過成舍我辦的世界日報上刊載的專欄，大致不會是捏造的。誰知過了一兩年，那個憤於「耍」人的袁世凱，却被後生小子閻錫山，妙不可言的也給「耍」了一下。

癸丑二次革命之役，山西都督閻錫山，浙江都督朱典，都沒有表示什麼態度，袁世凱大為不滿。事後袁氏先後召見閻、朱兩人，當面責問：亂黨造反，中央派兵討伐，你要麼就擁護，要麼就反對。可是你却悶聲不響的沒有任何表示，這種騎牆觀望的作風，打的是什麼算盤？詞色俱厲，聽者悚然。但是袁氏認為浙江遠在東南，一時不便動手。而且朱典才具平庸，也不會構成大患。於是臨之以威以後，繼而啗之以利，便把朱典給玩弄的服服貼貼，然後就放他回去。對閻錫山却是另外一種看法。因為山西密邇京畿，形勢重要，閻錫山又是同盟會的人，臥榻之側，不容養虎，袁氏原打算把閻調到北京任職，另外派人接替。那知閻錫山非常精靈，早就洞察袁的肺肝。他到京時，正值炎夏，見袁時却在貼身穿了一件皮背心，直熱的汗流滿面，而且俯首不敢仰視，談話也結結巴巴的一味是是是。袁世凱看見他這種胆小不堪的樣子，認為他在山西起不了什麼作用，乃即改變心意，故示寬大，教訓兼撫慰了一番之後，也就放他回任。想不到三十歲剛出頭的閻錫山，居然憑那件皮背心熱出來的滿頭大汗，把袁世凱給「耍」了個暈頭轉向，很輕易的過了關，保住了都督寶座。他從此一直在山西穩坐了三十多年，建立了一番事業，成為全國政治舞台上僅有的一個不倒翁，直到三十八年華北淪陷為止。袁「耍」黃，閻又「耍」袁，「耍」人者人恆「耍」之，信不誣也。

閻錫山工於心計，機智過人，他一生中以特

殊奇妙的手法，應付過許許多多複雜微妙的難題。民國十五年，他對岳維峻又來了另外一套。那時國民二軍在河南失敗，岳維峻隻身由豫西渡河入晉，原想轉道回陝，不料却被晉軍識破逮捕，送到太原。閻錫山把他款留起來，特予優待，却不承認他是岳維峻。因為閻知道大勢所趨，國民革命快要成功。但是他尚在吳佩孚、張作霖兩大勢力夾持之中，對於這位落難的革命將領，視同燙手山芋，既不敢殺，又不能放。而且恐怕吳、張中之任何一方，知道岳維峻在山西，向他要人，那就更難應付。於是就給他來個死不認賬，免生困擾。岳維峻就這樣隱姓埋名的被「優待」了大半年，直到北伐軍進出湘鄂，馮玉祥大軍入陝，才給放了出來。

在外蒙練兵的說法

岳維峻回到陝西，本想東山再起，有點作爲。可是他看到西安城中，一股左傾狂風颶起的烏煙瘴氣，實在鬧的不像話。他大爲失望，稍事盤桓，跟于右任和其他幾位朋友，匆匆的晤面寒暄之後，就回了他的老家蒲城。不久，馮玉祥到西安，看到陝西各軍紛亂渙散，亟須統一編整，統一指揮。乃召見與陝軍各部多有關係的史直，囑其前往蒲城，邀促岳維峻晉省，委以南路軍總指揮名義，所有陝軍各部隊，一律納入南路軍的範圍。岳維峻由蒲城晉省，路過大荔。其時盤踞大荔城內頑抗國民軍的是麻振武，在城外圍攻的則是方振武，兩個振武一攻一守，打的正不可開交。岳和方是老朋友，便停下來與方見面，研商以

後的行止。方振武對於馮玉祥把國民聯軍各部隊原來的番號，完全改編，統統納入第二集團軍的序列，頗不爲然。而且覺得馮玉祥性情嚴峻褊狹，不易相處，乃有另謀出路的打算。岳聽了也有同感，故於接受南路軍總指揮的任命之後，密派王宗山由山西繞道天津，前往南京，向蔣總司令翰誠。後來方振武出潼關，岳維峻出荆紫關，開往河南作戰，便都投效了中央。岳維峻以後的行動歸宿，筆者已在「國民二軍揚威河南」一章中，詳細敘述，此處不贅。馮玉祥在派史直赴蒲城邀約岳維峻之前，先派史赴富平，拜望胡景翼的老太爺，送了兩件由寧夏帶來的白羔羊皮筒子，對這位父執表示一點敬候之意。并促請胡老二（胡景銓，胡景翼的二弟，曾在國民二軍任師長。

）趕快收集舊部，承接乃兄的遺志，繼續爲革命効力，由此看來，馮玉祥敬長念舊的人情味，倒是濃厚的。上面所說的這般事情，其中與王宗山和史直有關的，都是他兩人親口對我所說。王宗山一名登雲，陝西醴泉人，曾留學美國。民國十二年，蔣介石赴俄訪問，王和沈定一，張太雷都是隨員，王任祕書。以後由俄回國，在黃埔軍校及黨軍中任職。民國十四年，岳維峻任河南軍務督辦，王就北來參加岳的幕府，贊襄戎機，以後隨岳頗久。後來岳維峻失敗，他回到西北，從事地方軍事及黨政工作。來台後任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，兩年前謝世。

王宗山還曾對我透露過一件人所少知的故事。他說：民國十二年，蘇俄答應 國父，在外蒙古給我們成立三個混成旅，作爲在北方的革命武

力。國父乃派蔣公赴俄接洽，并負責編練指揮。不料我們一行到達莫斯科後，俄方却變了卦，事遂中止。我們乃在俄國考察了幾個月，即行歸國。關於這一件在外蒙古編練軍隊的事，從未見有任何文字記載或傳述，我是第一次聽到王宗山如此說，當時在座者尚有胡伯玉（璉）將軍和高仲謙等幾位朋友。我們曾建議他把這一段珍貴史料，以文字發表出來。他說：蔣先生從未宣示過，我又何必多事。此事真像究竟如何？現在已無從稽考。不過王宗山是當時身歷其境的人，故能言之鑿鑿，特錄出以供治史者參考。史直是陝西長安人，以文人而周旋於軍政各界，頗受重視。抗戰及戡亂期間，在陝西歷任縣長，行政督察專員，省府委員等職。來台後從事教育工作，淡泊自甘。現已年逾八十，長髯垂胸，精神矍鑠，其身心的健康狀況，不遜於一般中年人，而勤求學問，熱誠助人，尤爲人所稱道。方振武投歸中央，編爲第一集團軍第十一路軍，後又改爲第四軍團。北伐成功後，方曾一度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，不久，部隊改編，他也失位失勢。

以上是國民第二、五兩軍的演變情形。

徐永昌轉變為晉系

至於國民三軍，馮玉祥把它編爲第二集團軍左路軍，以徐永昌爲總指揮。依照馮的原定作戰計劃，是要派徐率部由陝渡河，假道山西，沿正太路出娘子關。攻略石家莊，斷絕奉軍的後路。可是徐入晉後，受到當時當地的情勢限制，無法按照預定計劃進行。因爲他是山西人，便爲閻錫

山所收編，徐永昌也就成爲閩的大將之一，歷任綏遠及山西兩省主席。抗戰期間，調入中樞，擔任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部長，掌理全國軍事作戰業務。勝利後奉派代表中華民國，在停泊於日本海的美國密蘇里號兵艦上，與麥克阿瑟元帥，接受日本投降，享受了最大的勝利歡欣，實爲他個人生平至高的光榮。戡亂末期，出任國防部部長。

在台逝世，埋骨於台北陽明山。國民三軍的另一支楊虎城部，雖然也源出陝西靖國軍，但他自右任於民國十年離軍後，一直自樹一幟，保持了僅存於西北的革命武力。民國十四年，國民二軍在豫、陝兩省，鼎盛一時，楊虎城却謝絕二軍的招攬，而投入了國民三軍，編爲該軍第三師。十五年保衛西安之役，楊虎城的態度最堅決，出力也最大。西安解圍後，馮玉祥論功行賞，升編他爲第十軍，他不肯歸屬岳維峻，自率所部，在鹿鍾麟指揮之下，開出潼關，轉戰豫、魯各地。民國十八年討伐唐生智及十九年中原大戰，楊虎城均曾立了大功，由新編師師長，躍升爲第七軍軍長，第十七路軍總指揮。隨即揮師回陝，繼顧祝同任潼關行營主任，後改爲西安綏靖主任，陝西省主席等要職，確曾煊赫一時。最後因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「西安事變」的一步錯棋，弄得聲敗名裂，斷送了他一生革命的光榮歷史，殊堪惋惜。楊虎城從民國初年嘯聚部衆，參加陝西靖國軍時代起，一直打着革命的旗子，從來沒有轉變過。這與當時南北軍人中朝秦暮楚，東投西靠的作風，大異其趣。他曾在陝西耀縣，成立三民軍官學校，培植幹部，西安圍城期間，該校移設於西

安東關，弦歌依然不輟。關於楊虎城其人其事，我想另寫一篇專文，作較詳盡的敘述。

本來在談國民軍的整編和訓練，不料說溜了嘴，竟然牽枝攀藤的越扯越多。好在事關史實，就便把它提出來，也不無參考價值。現在就此打住，掉轉頭來再說訓練。

整訓着重政治思想

軍隊中所謂訓練，拏今天的標準來說，當然包括軍事和政治兩大部門。但在民國初年，却只以軍事上的學術科爲主，根本就沒有政治訓練那門課程。國民一軍關於軍事方面的學術科。本來就訓練有素，程度非常良好。現在整編就緒，一切按部就班的舊課重溫，更求進步，自不會發生什麼問題。當前最重要的，則是政治和思想教育的從頭做起。關於這一點，本來在民國十三年冬「首都革命」以後，他們就已注意到了。但因師資和教材均感缺乏，顯然收效不太大。至於二、三、五各軍，則連軍事訓練都較差，更談不上什麼政治和思想教育了。說到國民一軍政治意識的轉變及其與國民革命的淵源，應該遠溯至民國七年二月，馮玉祥在湖北武穴通電主和，曾蒙 國父手書嘉勉。以後駐防湘西，便和廣東方面有所連絡，馮玉祥本人對於 國父的學說主張，才有了初步接觸。九年七月，馮軍北調，暫駐漢口附近的諶家磯。馮氏曾派代表持函到粵，晉謁 國父，有所報告和請示。 國父即派徐謙、鈕永建兩人，到漢口見馮報聘，帶來了許多有關革命的書籍刊物，馮乃對革命得到更多的瞭解。民國十二年

，馮軍移駐北京以後，國民黨人在北方活動的，如徐謙、顧孟餘、汪精衛、孫科、吳敬恆、于右任、孔祥熙、李烈鈞、陳友仁以及黃郛（黃係同盟會舊人，雖然未向國民黨歸隊，但其對於革命救國的熱誠和努力，與國民黨的同志，實際上是殊途同歸。而其給予馮玉祥的影響，則較任何國民黨人爲大。）等人，常相來往。其中關係密切的，則是黃郛、徐謙和李烈鈞。馮氏得以深知革命的大義，參加革命的行列。可以說完全出於上述諸人的傳播和援引。關於黃、徐、李諸人與馮玉祥的結納和影響，筆者在前面有關各章中，均已述及。這裏應該特提一筆的，則是孔祥熙給馮特別重大的啓示和效果。

馮與國民黨的交往

原來孔祥熙是虔誠的基督徒。因爲與馮玉祥信仰相同，兩人早就熟識。其後往來日久，孔更知馮氏刻苦自勵，頭腦較新，治軍極嚴，紀律甚佳。民國十三年一月，孔氏赴粵，曾向 國父密陳與馮結識經過，及馮氏個人與其部隊的諸般狀況。請 國父虛懷接納，爭取其爲革命效力。 國父深以爲然，乃親書建國大綱一份，交孔祕密攜帶，北上贈馮，進行說服。建國大綱是 國父當時完成不久的建國寶典，在北方尚未普遍流傳。 國父親筆書寫，派專人持贈馮玉祥，并以進行北方革命事業的重責相委，其意義就更不尋常。馮氏看見建國大綱所列各端，綱舉目張，條理井然，既欽服，又感動，更堅定了他在北方實行革命的決心與努力，於是乃有是年十一月「首都

革命」之發動。以後馮氏常對人說：「國民黨在北京起義，建國大綱實為有力的鑰匙。」後因國父逝世，他遺留下這份唯一親書的建國大綱，已成國寶。孔祥熙乃向馮氏商請索還，奉獻給國民黨中央。關於此事的經過情形，民國二十五年二月五日，國民黨黨史編纂委員會開會時，孔、馮兩人，各有詳細報告，列入紀錄。民國五十六年八月孔祥熙在美病逝，先總統蔣公手撰「孔庸之先生事略」中，曾說：「曾密攜 國父親書建國大綱，往說北方將領，對於華北黨務之擴展，及士氣人心之鼓勵，貢獻至宏。」就是指此事而言。

國父贈發黨義叢書

民國十四年一月，國父行抵北京，派人給馮送了三民主義六千冊，建國大綱及建國方略各一千冊。馮氏得到後視為至寶，立即分發給各部隊，列為學科中的正課，要求所有官兵，均須悉心研讀。對於駐在張家口及其附近地區的部隊，馮和他的夫人李德全，親自給官兵們講解三民主義。并規定時間，集合官長，要他們一段一段的輪流誦讀解釋，以測驗其進修的程度，并加深深家的重視和瞭解。從此開始，馮玉祥對於 國父的思想學說，才算有了深刻而有系統的認識。馮軍官兵的政治思想教育，也便有了進一步的展開。此時馮玉祥尚未加入國民黨，他自命為黨外的中山主義信徒。是年三月，國父在北京逝世，馮氏立即通令各部隊，以三民主義為官兵的必修課程，且宣布「國民黨部隊就是中山先生的部隊」。十五年四月，馮玉祥於赴俄途中，行至庫倫，接受了徐謙的介紹，正式加入國民黨，成為國

民黨的一份子。八月二十三日，馮由俄派回國的代表李鳴鐘和劉驥，到了廣州，代表全軍宣誓加入國民黨。國民黨中央，即日發表馮氏為國民黨黨代表。

五原誓師後的黨化訓練

九月十七日，馮玉祥在五原誓師典禮上，正式接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新國旗（以前是北京政府頒發的紅、黃、藍、白、黑五色國旗。）及國民黨黨旗，即席宣布全軍加入國民黨，他本人也接受了國民黨任命的兼國民黨全軍黨代表的職務。至此，國民黨便正式式的成為在北方的黨軍，國民黨全體官兵，也便都成為國民黨的黨員了。它們既然成了黨軍，一切就要按照黨的規定辦理。於是總司令部及各部隊，都立即設立了政治部，加強政治訓練工作，淨化官兵思想，鼓舞官兵精神，提高官兵士氣，使國民黨成為有主義、有信仰、名符其實的革命隊伍。它們一方面從事三民主義的正規教育，規定軍官必須背誦國父遺囑。一方面根據主義，編成容易懂容易唱通俗歌曲，頒發全軍，教導官兵歌唱，以激發其興趣和領受。并提出軍隊政治化，打破官僚習氣，拔除陽奉陰違的惡根三個口號，要求各部隊澈底做到。馮玉祥不斷的集合各部隊親自訓話，而且一班一班的躬親考驗。在五原、寧夏、平涼的短暫停留期間，都毫不放鬆的嚴格督導，澈底實施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在西安的時間較長，他更專心一意的督促進行，所以進步就更大。

由劉伯堅負責政訓

此時最成問題的，是政治工作幹部的缺乏。主持總部政治部全盤業務的副部長劉伯堅，乃就西北軍官學校（原稱幹部學校）在北京招收的第一期學生中，甄別選拔，加緊訓練。

這批學生是民國十四年上海「五三慘案」發生以後，痛憤帝國主義者的暴行，為「反帝」而投筆從戎，四面八方前來馮軍投效的。

他們大都具有高中以上的程度，施以短期訓練，就成為很好的政工幹部。在訓練期間，馮玉祥每天給他們講國民革命史，劉伯堅講三民主義，都是很叫座的。後來又在甘、陝各地，大量吸收在學青年。其時國民黨改組不久，生氣蓬勃，革命怒潮，澎湃全國，激發起智識青年從軍報國的狂熱。國民黨的新銳作風，籠罩於大西北，軍行所至，一經號召，青年們便都熱烈的加入了革命行列。這一需要迫切的政工幹部問題，大體上便獲得初步解決。劉伯堅是四川人，原來留學法國，後轉入莫斯科東方大學，他早就加入了共產黨。馮玉祥訪俄時與之結識，隨馮回國，主持國民黨軍政治工作。他才華很高，做事非常熱心，有幹勁，有魄力，勤勞負責，注重時效，每日工作十八小時以上，孜孜不休，廢寢忘食。對部屬督責很嚴，毫不放鬆。在他主持政治部的期間。工作績效非常良好。馮玉祥對他很賞識，很倚重，不因他是共產黨員而有所歧視。所以他能够放手做去，儘量發揮。在國民黨五原誓師以至會師北伐這段時期，劉伯堅對國民黨貢獻很大。十六年清黨後，他被遣離，以後不知所終。